

公益人的担忧： 市场化是否会摧毁脆弱的公益生态

■ 本报记者 王会贤

8月初本报记者到青岛中国公益产业高峰论坛采访,回北京后不两天,同被邀请到公益产业论坛致辞的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,召开了《公益向右,商业向左》新书发布会。一时间,“公益产业化”、“公益市场化”、“社会企业”这些词汇又掀起一阵言论上的高潮。

在一片公益向右的呼声中,自然也会有反对之声,认为公益不能成为商业的马仔。第三部门与第二部门的联手,会形成什么样的局面?这是个一本书都写不完的话题,这里只是将各方观点展示给大家看一看。

徐永光：
所有社会问题都是商机

弥补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有效解决社会问题,是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舞台。杭州一位年轻的创业者对我说:“所有社会问题都是商机”,这话很有道理。——这是徐永光在发布会上的发言,并表示,“民非+企业”双轮驱动模式”是中国独特的社会企业发展模式。

“英国被称为社会企业第一大国,目前也就七八万家社会企业,如果把中国30万家民非+公司机构划归于社会企业或准社会企业,可以说,中国已经是社会企业世界第一大国了。首届中国社企奖获奖企业背后有民非的占了三分之一。”

“民政部最新统计,2016年全国共有民办非企业单位36.1

万个,其中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文化、体育、科技和工商业服务类超过30万个。这些与公共服务领域相关并进行公益登记的机构,绝大部分是私人投资的。因为投到公益机构的钱都拿不回去了,他们背后都有一家公司。自1998年设立民非制度以来,这种存在模式政府心里是很清楚的。”徐永光说,“2015年,民政部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等10部委发出的《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,明确提倡用民非+企业双轮驱动模式来吸引社会投资,发展养老事业,允许双方可以进行资金借贷和财产租赁等项关联交易,并接受政府监督。”

“我深信,公益向右,能提升千亿公益资源的配置效率,再造千亿市场创新空间。千亿是保守的,每年千亿,还会裂变放大;商业向左,将激发万亿社会投资。公益与商业合流于社会企业,公益、商业与政府跨界合作,形成宏大的社会创新力量,将有效、可持续地解决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。诚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言:唯有把解决社会问题当成有利可图的机遇,社会问题才能最终得到解决。”

对于担忧的声音,徐永光也表示:对一些坚持“初心”的人来说,可能会受到价值观的冲击,甚至感觉受到伤害。希望质疑我的朋友,在认真读完这本书后,也许会认同我;或者读出书中破绽,给我指教。

李劲：
“商业向左”会不会摧毁并不牢固的公益主体

“中国的商业界,中国的企业家,对公益大量的介入和大量的参与,会不会摧毁中国本来很脆弱的公益传统?当然这个传统来源很多,包括草根NGO、西方的源头、企业家的源头,但这些组合起来还是非常脆弱的。这样一种并不牢固的组合,会不会被当前的商业向左、公益向右时候摧毁,这是我最近特别多思考的问题。”李劲说,“其实徐老师出了重磅的炸弹,这个炸弹他会在中国的公益圈里面关于什么是公益?什么是商业?公益和商业真的可以结合生孩子吗?还是说在中国的工业界实际上就像一把利刃一样的把公益劈成两半?”

“第三部门的独立意志、志愿性和非政治性、公共性等基本要素,我认为已经被冲击得不清楚了,公益圈里面集结两种力量,一种是往商业去,向商业学习,一种回到公益的本原。”李劲提出了疑问,“我们是不是有些人回到公益的本原,或者所谓的公益本原,有些人会在商业和市场化的道路上狂奔,最后他们不会在某一个点上汇在一起,一起对更好的中国做一个交代?”

李劲的担忧其实也代表了很多公益人的想法。知名公益人邢陌在对99公益日进行探讨时发文:拿钱多不一定是好公益,公益也不是商业的“马仔”,表示:向商业领域学习技术和方



法、获取资源,公益与商业相互合作、相互支持肯定有助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和解决社会问题。同时,坚守公益价值观能够促进商业领域更好地实现社会责任。但把商业领域不择手段去追求利润的价值观带入公益,是饮鸩止渴,结果是摧毁公益。

实践的心得：
以服务对象为主体

记者在采访北京永真公益基金会创始人周惟彦时,同样问到过:做慈善的企业和加入商业模式的公益组织,哪一个更对国内环境的路子?周惟彦讲了自己实践中的感受:以我们儿童友好社区这个项目来说,越做,越觉得接近商业模式。商业模式太强大了,所以特别考验人的智慧和

发心。快速盈利和理想情怀怎样平衡的问题,常常使人纠结,现实是,在生存面前,情怀太脆弱了。

香港社会创业家张瑞霖在徐永光的发布会上,讲了一点值得学习的经验:国外的政府现在在做公共服务时,越来越多的不是把钱给了某一个志愿团体,而是把钱给个人,比方你是有养老需求的,你是有残疾服务需求的,这个钱给你,让你去寻找供应商。这一下位置转变了。香港已经开始推行类似的做法,比如你要住养老院,根据你的身体情况,给一笔钱你自己去选,你可以选政府办的,你可以选私人办的等。这样对市场冲击是很厉害的,有了很多竞争力的服务商,政府还省了钱,那才是最有效的。

中国不能在控烟问题上当“留级生”

■ 本报记者 文梅

8月23日下午,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、中国控烟协会、中华预防医学会等37家单位在北京联名发布“加速中国控烟履约进程——专家共识2017”,呼吁中国加速控烟履约进程,以实现“到2030年15岁以下人群吸烟率低于20%”的目标。

为了遏制烟草造成的致命流行,包括中国在内,全球已经有180个国家批准了世界卫生组织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(以下简称公约),公约及其实施准则所规定的一系列减少烟草供应和需求的措施,在国际社会已经证明行之有效。

2006年1月8日,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在中国正式生效,至今已经超过10年,回顾中国控烟历程,此间专家和学者认为,虽然亦有付诸努力,但落实仍然不到位,尚未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。

据统计,目前,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国、消费国和受



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宜群表示:控制烟草流行,保护公众健康,是政府当仁不让的职责。

害国,有烟民3.5亿以上,还有7.4亿人口受到“二手烟”的危害。据2012年卫生部发布的相关报告指出,中国每年有100多万人死于因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。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开

发计划署的综合报告,2014年,烟草使用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达3500亿元人民币左右。另据科学研究预测,如果烟草流行态势得不到有效控制,到2050年中国每年将有300万人死于

烟草相关疾病。

更令人担忧的是,近些年中国吸烟者总数仍呈现上升趋势。2010到2015年间,中国国内吸烟人数增加了1500万,吸烟者日平均吸烟15.2支,与5年前相比,还增加了1支。

此间学者援引美国《商业周刊》的报道称,2014全球每100支香烟中,就有43支是出自中国烟草总公司,烟草行业为中国创下多项世界第一:烟草种植面积第一、卷烟销量第一、吸烟人数第一等。

在23日的发布会上,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宜群表示:控制烟草流行,保护公众健康,是政府当仁不让的职责。

她认为,中国控烟的主要难点在于要对烟草业这个纳税大户“痛下杀手”,即使实施过程中阻碍重重,也要拿出足够的诚意和切实可行的办法,一点一点推

动控烟之路向好发展。比如最简单的,烟盒上采用警示图形。目前在烟草包装上采用图形警示标识的国家/司法管辖区已达105个,覆盖全球58%的人口,中国的烟草包装却因烟草业的阻挠,至今维持着“美丽烟包”的形象和温和含糊的“文字警句”。

吴宜群认为,相较于世界各国在控烟问题上的积极推进落实,中国控烟显然已经属于“后进生”,要想办法知难而进,赶上去,否则就会被远远甩在国际控烟大军的队末,落得个“留级生”的被动和难堪。

据此次发布会提供的调查资料显示:截至目前,中国控烟效果不佳,多项指标尚未达到世卫组织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标准。根据《公约》指标体系中的十项标准来测量,中国目前的控烟得分为0,这十项标准包括是否存在烟草赞助、产品展示、品牌延伸等,中国均不同程度存在这些行为。